



左图：1991年傅聪来香港举行香港翻译学会主办的“傅雷纪念音乐会”，演出后与时任会长、本文作者金圣华合影。

在香港商务印书馆展出，是为海内外傅雷生平的第一次布展。10月24日，傅聪傅敏二人，一个来自台北，一个来自北京，于同日抵港。难得的是傅聪，10月29日才是演奏的日子，为了参加连串纪念活动，他居然提前五天来到，这可是绝无仅有之事。于是，我这主办者也就因此有机会贴身全程参与了他在演奏前悉心准备的过程。

24日在启德机场接了傅聪，一到旅馆，曾福琴行就把练习用的钢琴送上房间，音乐家也就马上进入情况。随后的几天，他除了天天练琴，一律保持低调谢绝采访。那几天杨世彭执导的话剧《傅雷与傅聪》恰好在香港上演，傅聪于首演当天在启幕后悄悄进场，散场前静静离开。至于傅雷纪念展览会，他也是在开展前默默去参观的。那些天，他心无旁骛，全神贯注在音乐上，誓要以最佳的演

出向父亲致最深的怀念。演出前，我陪他去文化中心查勘场地，那是一套非常严谨的程序，傅聪要求的是一架音色最佳的钢琴，一个技术最好的特定调音师，一张最合适的琴凳，琴凳的倾斜面必须合乎某个角度，记得那天琴凳怎么都调校不妥，一时情急，我还得速召外子从家里送个垫子来。10月29日的纪念音乐会，终于在全场满座的盛况下顺利演出。音乐会后，兄弟二人终于可以松口气，坐下来慢慢谈心了。傅聪对傅敏说：“要记得，我对政治毫无兴趣，但是正义感却不可一日或缺！”

这场音乐会，为翻译学会募集了数十万款项，成立了傅雷翻译基金，并支援了学会往后几十年的运行与发展。尽管如此，举办之初，仍听到一些目光欠缺的会员说，“翻译学会办翻译活动也罢了，搞什么音乐会！”他们哪里知道，傅聪以

音乐来纪念父亲，是含有多重意义的。其实，只要真正了解《傅雷家书》的价值，就可以明白在对精神领域的追求上，傅雷与傅聪二人完全如出一辙。《家书》不是普通父子之间的闲谈，而是“艺术家与艺术家之间的对话”，他们畅谈艺术，纵论人生，而他们毕生从事的工作——文学翻译与音乐演奏，无论在形式或内涵上都彼此类同，再没有其他艺术范畴可以比拟！前者以文字表达原著的风貌，后者以音符奏出乐曲的神髓，翻译者对原著的倚重，恰似演奏家对乐曲的尊崇，两者在演绎的过程中，都有很大的空间去诠释，去发挥，但必须有一定的章法和依据，不能乱来。翻译家的自我，就如演奏家的个性，傅聪曾经说：“真正的‘个性’是要将自己完全融化消失在艺术里面，不应该是自己的‘个性’高出于艺术。原作本来就等于是我们的上帝，我们必须完全献身于他”（见《与潘耀明对话》）。在这一点体会上，傅雷与傅聪完全是心灵相通的，他们父子二人，走的是同一条路！

在1992年跟傅聪所进行的访谈录《父亲是我的一面镜子》中，他坦承父亲性格中的种种矛盾，如愤世嫉俗而又忧国忧民；热情洋溢而又冷静沉着，以及毕生历经的多重痛苦与磨难，似乎都由他承受下来了。傅雷处事冲动，傅聪指着自已那张俊脸上唯一的缺陷——鼻梁上的疤痕，回忆起童年旧事：“他在吃花生米，我在写字，不知为什么，他火了，一个不高兴，拿起盘子就摔过来，一下打中我，立即血流如注，给送到医院去”。傅聪认为自己也常常冲动，他曾经对我表示，“我